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西方非政府组织参与东非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联动机制研究.....	2
各国动态	10
肯尼亚.....	10
乌干达.....	10
坦桑尼亚.....	10

专题聚焦

西方非政府组织参与东非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联动机制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各地掀起民族独立的浪潮，东非国家纷纷走上反抗殖民主义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初，东非国家先后取得独立，开始了自主国家治理的探索。与此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为代表的新治理形式出现，在减少贫困、医疗卫生、经济发展、民主人权、环境保护等多种领域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在冲突与合作中不断发展，最终趋于稳定。20世纪7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出“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发展层面的调控能力，国家职能相对衰弱，非政府组织进一步起到了弥补国家职能不足的作用。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东非国家治理，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同时也与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产生联动。本文将梳理二战后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国家的发展历程，并藉此探究其参与东非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联动机制。需要说明的是，东非国家的范围有多种界定方式，本文主要探讨其中曾是英属殖民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

一、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的早期发展

非政府组织，英文名称为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简称 NGO。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东非国家运营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即非政府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非政府组织”这一术语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中首次应用，而事实上，早在这一术语出现前，非政府组织就已经存在，如乐施会（Oxfam）、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国际社会一般比较认同1950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第288号决议中的界定：“任何国际组织，凡不是经由政府之间协议而创立的，都被认为是为此种安排而成立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1968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第1296号决议中重申了上述定义，且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扩大为“包括那些接受由政府指派成员的组织，只要这些成员不干涉内部的言论自由”。

西方非政府组织参与东非国家治理活动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国家仍处于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三国属于英国殖民地，域内活跃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教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当时，殖民政府颁布的政策很少考虑非洲人的利益，其目的是维持殖民统治框架的完整性，从而确保对殖民地进行有效剥削。殖民政府为东非当地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微乎其微，且即使存在少量的公共社会服务，其目的也是服务宗主国居民，比如当非洲人居住地有流行病爆发时，殖民政府会提供一定的医疗服务，不过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传染病扩散到白人社区。殖民政府为非洲人提供教育服务的重要出发点，也是为了便于其对当地人进行管理。相比之下，殖民政府用于白人居民的开支通常很慷慨。

在非洲国家独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非政府组织与殖民地国家政府开展了不同程

度的协作，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服务。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大部分时间内，殖民政府只为少数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当地居民只能靠一些慈善机构和教会获取物质支持以及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在肯尼亚，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教会和当地政府合作紧密。教会提供了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殖民时期，西方传教士兴办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诊所，为肯尼亚提供现代化医疗服务。自19世纪末起，传教士还将正规的西式学校教育带到肯尼亚，教会提供了肯尼亚当时大部分的西式教育机会。

此外，在政治层面，教会和慈善机构还充当了“维稳者”的角色。在肯尼亚独立前夕的社会动荡时期，社会运动频发。起初，这些由非洲人发起的“草根”运动规模不大，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取独立自主，许多仅仅是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如居住权、用水权、土地权、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等等。殖民政府大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应对这些运动。肯尼亚“草根”运动的高潮是1952年的“茅茅运动”（Mau Mau Rebellion）。茅茅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运动，举事的团体称为“茅茅”，成员多为基库尤人。在这场殖民政府与起义者的武装冲突中，官方称有95名白人和11503名非洲起义者死亡，但现在普遍认为起义者的死亡人数远远多于这个数字。

然而，并非所有控制非洲人的举措都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完成的，事实上，意识形态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正如恩古吉·瓦·提翁戈（Ngugi wa Thiong'o）所指出的那样：“殖民主义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独裁对殖民地实施控制，但殖民主义最重要的统治领域是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即通过文化控制人们如何看待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没有精神控制，经济和政治控制就不可能彻底或有效。”这也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备受争议的原因所在。

客观上看，西方非政府组织一定程度上为独立前的东非国家提供了社会服务，但一些学者认为，以教会和慈善机构为代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还充当着意识形态输出的角色，教会在提供社会服务时，还向非洲人传递“福音”，宣传西方的文明理念，使非洲人“摆脱愚昧、懒惰和堕落”。它们凭借良好的基层触达能力，传播乐善好施的观念。此外，政客们还经常渲染民族革命的威胁，试图减少人们对于反抗殖民统治的关注，以此达到转移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动荡的目的。例如，教会和政府合作推出了“社区发展倡议”，该倡议旨在安抚民意。可以说，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国家的殖民主义框架下，不仅是为了帮助穷人，也是为了保护富人。

有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也直接参与了压制反殖民斗争的活动。例如，在肯尼亚，西方非政府组织如妇女发展组织（Maendeleo ya Wanawake, MYWO）、肯尼亚基督教理事协会（Christian Council of Kenya, CCK）参与了对“茅茅运动”的镇压。茅茅运动的大规模起义爆发于1952年，英国总督当年10月宣布国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同年，妇女发展组织成立。成立之后不久，该组织就渗透到了基库尤族群的各个村庄，并得到了政府社区发展部的年度拨款支持。它告诉加入该组织的非洲妇女，如果不放弃对“茅茅”的承诺，就无法获得该组织提供的“人道主义”服务。此外，该组织还鼓励非洲妇女透露其邻居和亲戚的日常行踪。与之相似，肯尼亚基督教理事会为应对紧急情况，推出了“康复计划（Rehabilitation Programme）”，为集中营中的被拘留者提供“教牧关怀”，这是审讯过程的委婉表达。这一过程筛选出了“忠诚的非洲人”与潜在的“不安定分子”。另外，它还在内罗毕的贫民窟建立了社区中心，把“康复计划”扩展至受茅茅起义影响的社区。

由此可见，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国家运营由来已久，深入民间。在东非国家独立前的

这一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殖民主义色彩比较浓厚，通过与殖民政府合作的形式参与国家治理，其本身一定程度上就是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二、 东非国家独立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东非国家取得独立后，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初步发展，随着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非政府组织取得了蓬勃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乌干达（1962）、肯尼亚（1963）、坦桑尼亚（1964）三国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新兴的国家亟需经济建设和发展，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非政府组织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民间机构”，其发展依托于当地国家和政府，无法摆脱其制约。因此，对于民族独立后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说，其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建构与东非国家政府的联动机制，从而合法参与治理进程。而对于新建立的东非国家政府而言，西方非政府组织既是治理的帮手，又是不安定的因素，一方面，专注于发展援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能够为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提供帮助，凭借其深入基层的特点惠及落后地区的群众；另一方面，尽管独立后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大多数以发展援助为活动目标，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一定程度上对独立后实行一党制的东非国家造成了威胁，这一点在冷战时期表现尤其突出。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后殖民时代有关“人权和发展”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现代国际人道主义也是帝国的产物。总的来说，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联动机制保持着冲突和合作并存的特点。

（一） 政府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冲突

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的非政府组织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非常不起眼的边缘性行为体。总的来说，独立初期东非国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有压倒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政府的包容和庇护。大多数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后，政府都担心会爆发种族内战，因此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也不例外。国家内部不同的种族、地区、宗教和语言等对新成立的政府构成了不小的隐患，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使得政府对多元的社会组织活动采取限制措施。

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任何组织都不应存在于国家主体之外，因此东非国家政府往往倾向于对西方非政府组织采取压制的态度，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冷战氛围的影响，西方非政府组织很容易被怀疑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间谍机构。于是在坦桑尼亚，政府解散了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坦桑尼亚农村发展联合会”，在乌干达，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1989年，乌干达推出法案，把非政府组织置于国家安全部的管辖之下。2004年4月，乌干达政府推出了新的非政府组织法案，要求非政府组织必须按照要求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此外，乌干达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向政府登记与注册，且只有在获得国家批准后才可获得国外的援助。在肯尼亚，国家承认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但是限制它们的发展。政府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对意识形态的警惕外还有其他原因。非政府组织在发展领域的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政府工作和政策的诸多缺点和漏洞，在道德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会大胆地向政府反应基层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而政府却往往不予接受，因为这些建议本身就是对政府行为的挑战，极易引起政府的敌意。

一般情况下，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力图和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并不直接组织和参与民主运动，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冲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尤其是在遭遇到政府不正当的压制或政

府企图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的立法时，非政府组织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工作环境，往往转而反对政府的压制行为。

例如，肯尼亚就曾出现这类维权运动。1990年，肯尼亚颁布《非政府组织协调法案》（the NGO Coordination Act），借此监督和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此，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团结起来进行了反复的斗争。130个非政府组织创建了“非政府组织网络”（NGO Network），以此作为统一内部意见和与政府谈判的工具。到1992年，加入该网络的非政府组织达到200多个。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团结起来，先对政府官员和议会进行游说，然后运用联合抵制登记注册等抗议形式迫使政府做出让步。1992年底，肯尼亚非政府组织迫使政府修改了此前的非政府组织法案，放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为自身的活动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除了政治上的冲突，政府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冲突还表现在经济方面。随着非政府组织声望日高，国际官方援助大量通过西方非政府组织进行，导致政府的可控资金大量减少，非政府组织成了吸纳外国资金的竞争者。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转向多党制，政治多元主义成为东非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普遍认可的政治观念。随着非洲民主化、多党制浪潮的平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逐渐走向稳定和成熟，二者妥协的成分增多了。经历了前一段交往的磨合，二者发展和丰富了打交道的手段和策略。

（二） 西方非政府组织对国家职能的补充

在发展实践中，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很难针对具体地区的具体需求做详尽的部署，因而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一方面，国家在地方具体问题上的政策空缺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留下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上层政策在具体实施时难以具体化、细节化，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为具体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政府组织补充了东非国家政府的部分职能。

20世纪80年代，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大量涌现。除了少数明确宣布其政治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外，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致力于非洲基层的援助和发展工作，在非洲农业发展、乡村社区建设、健康服务、教育、技能培训、民主人权等诸多领域，非政府组织成为非洲民众生活条件改善、基层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为体。

这一时期，东非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大幅增长，原因之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这一思潮下，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其他一些机构推行了“华盛顿共识”（因为这些机构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包括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旨在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进本地市场全球化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政策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发展等方面的开支，优先确保偿还债务。然而实际上，结构调整方案削弱了国家的职能，使其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留下了巨大的职能缺口，大幅度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非洲非政府组织迅速扩张，大力介入发展领域。例如，在肯尼亚，由于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预算开支下降，非政府组织迅速进入到这两个部门并成为独立的服务提供者。到1993年，肯尼亚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卫生服务占了整个卫生服务的近50%。

在执行结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非洲国家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很不得力，而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以缓冲结构调整计划造成的短期不利影响。非洲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援助领域表现出色，展现出高效、官僚化程度轻、深入基层的特征，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非洲国家政府无力扭转长期经济停滞和衰退的不利局面，效率低下、贪污腐化盛行，其威信受到削弱。鉴于此，部分西方慈善组织直接将善款汇入它们认为“更为透明”的非政府组织。一些“面向救助”和“面向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国际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和英国“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等，也因为其发放食物、药品、提供小额贷款等服务而获得了非洲民众的好感。在坦桑尼亚，20世纪90年代西方改变了援助政策，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地方非政府组织输送援助资金，这种方法被认为比捐资给政府当局更有效、腐败少并且更容易将资金送达穷人手中。由于预算的限制，政府逐渐从基层服务领域中撤离，而非政府组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坦桑尼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西方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能发挥补充国家职能的作用，除了国家的客观需要外，也与其专业能力有关。目前东非国家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主要活动在农业发展、医疗卫生、地方社区发展、妇女儿童发展、民主人权、环境等领域。比如，从事医疗卫生领域的有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等，从事儿童发展领域有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等，从事地方社区发展领域有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等，从事农业发展领域的有世界农民组织（World Farmers' Organization, WFO）等。

（三） 西方非政府组织与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的联动

国家治理需要多元化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不能完全依靠国家和政府，而是需要多种组织运作、协调。因此，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国家活动的过程中，除了与政府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外，还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

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受西方国家影响很大。一方面，一些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脱胎于西方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多数本土非政府组织由西方国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运营资金，比如肯尼亚最大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之一“绿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既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赞助，又受到荷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的援助，并是该组织的合作伙伴之一，其政策行为难免受到资助方的影响。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很难从国内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大多数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特别是来自美欧国家的政府和基金组织，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等都给予了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大量资金资助。以乌干达为例，国内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其实是西方国家在乌干达发展的基层组织，或是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本地组织。因此，这些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在规模、发展目标、运营经费等方面都受到西方非政府组织甚至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影响和支配。

西方非政府组织与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一直密切，从某种程度上看，前者通过控制后者发挥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具体来说，西方非政府组织影响意识形态的方式主要通过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培训、咨询等来培养基层民众的亲西方情节，宣扬西方的民主理念。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全球民主化战略，其

突出特点就是许多时候不是直接由政府出面或背后支持、资助，而是由各种非政府组织以比较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来进行。此类举措在客观上增加了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力，推广了西方的价值观，也为西方建构了话语权。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等方面被西方非政府组织所把持和制约，一些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传声筒”，或沦为西方国家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战略工具。西方非政府组织享有话语权，在议题设置上具有操控权，这导致非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难免产生发出带有偏见的声音。例如，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African Wildlife Foundation, AWF）首席执行官卡杜·塞布尼亚（Kaddu Sebuny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对非洲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他还称，与中国相比，欧洲在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方面与非洲更相似，因此是非洲更合适的合作伙伴。

总之，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是西方非政府组织重要的合作伙伴。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资金资助等方式，借助本土非政府组织进一步推广自身的影响力。也正因如此，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对于西方的依赖过大。如何维护非洲本土利益，更好地表达非洲人自己的声音，是近年来非洲非政府需要关注的议题。

三、 小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国家的角色在变化中不断发展。殖民时期，以慈善机构和教会为代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同殖民政府密切合作，在为东非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也服务西方国家及其殖民政府利益。东非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西方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以发展援助为目标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其与政府的关系总体上看是合作与斗争兼有。在斗争方面，对政府来说，西方非政府组织存在不安定因素，需要加以规制；对非政府组织来说，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反抗东非国家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严苛管控，非政府组织联合进行了一系列抗争，并成功地使国家管控放松。在合作方面，西方非政府组织凭借其专业性，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弥补国家职能空缺的作用。此外，西方非政府组织还通过资助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拓展联动机制，更深入地参与东非国家治理，但其也因为过度干预非洲国家内部事务而受到质疑。未来，随着东非本土非政府组织力量的不断发展，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东非的活动或许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届时，其与当地政府、本国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的联动机制将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以不断适应东非国家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 Matthew Hilton, “Charity and the End of Empire: Britis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196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3, Issue 2, 2018, pp. 493-517.
- [2] Hofisi, Miriam & Hofisi, Costa, “State-NGO relations in Africa”,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3, pp. 291-298.
- [3] Brass, J, “Kenya as case study: Historical portraits of NGOs and the state”. In *Allies or Adversaries: NGO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4] Lisa Aubrey,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GOs, gender and partnership in Kenya”, *Routledge*, 1997.
- [5] Manji, Firoze, and Carl O’Coill, “The Missionary Position: NGO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pp. 567-584.
- [6] Ndegwa, Stephen N., “The Two Faces of Civil Society: NGOs and Politics in Africa.” *Kumarian Press*, 1996.
- [7] Shivji, Issa G., “The Silences in the NGO Discourse: The role and future of NGOs in Africa”, *Africa Development*, 2006, pp. 22-51.
- [8] Mutua Makau, editor, “Human Rights NGOs in East Afric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Tens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 [9] Mutua Makau, “Africa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Questions of Context and Legitimacy”, in Paul Tiyambe Zeleza, Philip J. Mcconnaugh. *Human Rights, the Rule of Law,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 [10] ECOSOC, Resolution 288 B (X), ECOSOC, New York, 1950.
- [11] ECOSOC, Resolution 1296 (XLIV), ECOSOC, New York, 1968.
- [12] Nikolaj Nielsen, “‘China model’ not suited for Africa, says African NGO chief”, *Euobserver*, 28 Jan 2019 [1 December 2023], <https://euobserver.com/world/144012>.
- [13] Lisa Aubrey,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GOs, gender and partnership in Kenya” , *Routledge*, 1997.
- [14] Zie, Gariyo, “NGO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Michael Edwards, David Hulme: “Beyond the Magic Bullet: NGO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Kumarian Press*, 1996.
- [15] Ngugi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James Currey*, 1986.
- [16] 李伯军：《当代非洲国际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 [17] 龙小农、陈阅：《NGO 与中国在非洲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的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 年第 7 期，第 57-61 页。
- [18] 张凯：《列国志肯尼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
- [19] 裴善勤、钱镇：《列国志坦桑尼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 [20] 魏翠萍：《列国志乌干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 [21] 罗建波：《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角色分析》，《国际论坛》2008 年第 1 期，第 7-13+79 页。
- [22] 王涛：《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活动及其影响——以非政府组织在乌干达的活动为例》，《红河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各国动态

肯尼亚

美、荷非政府组织在肯尼亚等国投资 1.5 亿美元启动牧场生态恢复计划

近日，美国非政府组织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与荷兰非政府组织和公园基金会（Peace Parks Foundation）在肯尼亚等非洲 8 国联合启动了一项名为“健康放牧”（Herding for Health, H4H）的牧场生态恢复计划，该计划预计投资 1.5 亿美元，得到来自安哥拉、博茨瓦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和捐赠者的资助。“健康放牧”计划旨在于 2030 年之前，使非洲 8 个国家 2000 万公顷的生态退化牧场恢复活力。计划的具体措施包括：推广轮牧，促进牧草再生；为牧民提供兽医，对牧民进行畜牧技术培训等。目前该计划已经在肯尼亚马拉（Mara）和丘鲁（Chyulu）地区进行试点。此外，该计划正与肯尼亚森林服务局（Kenya Forest Service, KFS）和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Kenya Wildlife Service, KWS）合作，带动当地牧民转型为掌握健康知识和疾病控制的专业人员。

——编译自 11 月 20 日 *Nation*

乌干达

非政府组织谴责乌干达石油业的官僚主义和不透明机制

近日，乌干达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环境倡导者联盟（Advocates Coalition for Development & Environment, ACODE）副执行主任奥内斯莫斯·穆根尼（Onesmus Mugenyi）谴责该国石油产业称：“无法获取关键信息严重阻碍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透明度。”其他社会人士也对政府机构内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政府安全人员的不公正行为表示担忧。对此，内政部长卡欣达·奥塔菲尔（Kahinda Otafiire）将军告诫称，民间社会团体不要受到反对乌干达石油勘探声音的影响。国家能源部也赞同这一观点，敦促民间社会团体警惕错误信息，继续关注石油勘探过程的责任和可持续性。

——编译自 11 月 23 日 *NilePost*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回收商协会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开展固体废物管理培训

坦桑尼亚回收商协会（Tanzania Recyclers Association, TARA）和德国国际发展机构（GIZ）近期合作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培训项目，以确保达累斯萨拉姆市拥有可持续的固体废物管理和利用机制。来自私营部门、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有关人士参加了培训。参训者考察访问了 Pugu Kinyamwezi 垃圾场。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项目顾问莉迪亚·洛克（Lydia Loch）女士表示，培训内容全面涵盖了可持续的固体废物管理方法，且能够让参与者从全球范围内的同行那里获得应对类似挑战的经验教训。“在处理固体废物方面，我们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网

络。因此，通过与 TARA 合作，我们相信从德国请来专家提供培训能够极大地启发固体垃圾处理相关活动的从业者。”参与培训的贝尔塔·卡兹本（Belta Kazimoto）女士表示：“这次活动中，通过对 Pugu Kinyamwezi 垃圾场的考察访问，我们亲眼目睹了达市垃圾管理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坚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

——编译自 11 月 18 日 *Daily News*

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获杰出公共服务终生成就奖

12 月 2 日，坦桑尼亚前总统贾卡亚·基奎特（Jakaya Kikwete）获得坦桑尼亚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CEO Roundtable of Tanzania, CEOrt）颁发的杰出公共服务终生成就奖，以表彰他和他的政府为坦桑尼亚经济发展做出的努力。基奎特于 2005 年至 2015 年担任坦桑尼亚总统。在获奖感言中，基奎特回顾了坦桑尼亚政府在第二任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的领导下开启转型、改善坦桑尼亚的投资环境的举措。“当时担任革命党主席的尼雷尔知道时代已经改变，因此社会主义政策也必须改变。”基奎特表示。他回忆道，自己在姆维尼执政期间担任财政部长，那时投资者纷纷离开坦桑尼亚，自己必须把投资者重新吸引回来。基奎特还称赞了哈桑总统领导的现任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该奖项由 CEOrt 主席大卫·塔里莫（David Tarimo）颁发，同时获得该奖的还有坦桑尼亚投资中心（Tanzania Investment Centre, TIC）执行董事吉利德·泰瑞（Gilead Teri）和坦桑尼亚创业协会董事总经理扎霍罗·穆哈吉（Zahoro Muhaji）。

——编译自 12 月 3 日 *The Citizen*

编译：田丰玮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